



中国共产党史稿

柳建辉 主编

第⑨卷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抗争

[1966.5—1976.10]

郑 谦 张 化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史稿

柳建辉 主编

第9卷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抗争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史稿.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抗争:
1966.5~1976.10/柳建辉主编;郑谦,张化著.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20-08351-8

I. ①中… II. ①柳… ②郑… ③张… III. ①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1966~1976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7072 号

ZHONGGUO GONGCHANDANG SHIGAO

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 9 卷)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抗争 [1966.5—1976.10]

柳建辉 主编
郑谦 张化 著

策 划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解 伟
唐海涛
杨 潮
袁晓红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5.75

插 页

3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8351-8

定 价

580.00 元 (全套共 12 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624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 (1)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 (2)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 (15)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 (25) |
| 第四节 走向“天下大乱” | (41) |
| 第二章 从“一月夺权”到党的九大 | (57) |
| 第一节 “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 | (57) |
| 第二节 “二月抗争” | (65) |
| 第三节 试图稳定局势的努力 | (74) |
| 第四节 “全面夺权”引发“全面内战” | (80) |
| 第五节 形势的反复与全国省级(台湾省除外)革委会全部成立 .. | (93) |
| 第六节 党的九大 | (105) |
| 第三章 全国性“斗、批、改”运动 | (116) |
| 第一节 九大之后的形势与格局 | (117) |
| 第二节 “斗、批、改”运动 | (126) |
| 第三节 “斗、批、改”的几项具体内容 | (132) |
| 第四节 70年代初期的又一次生产“跃进” | (158) |
| 第五节 人民的觉醒 | (164) |
| 第四章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与覆灭 | (172) |
| 第一节 政治投机与拉帮结派 | (172) |

| | | |
|------------|------------------------------|--------------|
| 第二节 |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 (180) |
| 第三节 | “批陈整风”运动····· | (190) |
| 第四节 | 林彪集团的覆灭····· | (200) |
| 第五章 | 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整顿 ····· | (210) |
| 第一节 | “批林”与“整风”····· | (210) |
| 第二节 | 毛泽东的反思和变化····· | (216) |
| 第三节 | 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整顿····· | (220) |
| 第四节 | 周恩来整顿的中断····· | (247) |
| 第五节 | 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 (254) |
| 第六节 | 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 | (259) |
| 第六章 | 从“批林批孔”到四届全国人大 ····· | (266) |
| 第一节 | 再度造成动乱的“批林批孔”····· | (266) |
| 第二节 | 围绕四届人大“组阁”的斗争····· | (283) |
| 第三节 | 四届人大和1975年《宪法》····· | (292) |
| 第七章 |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全面整顿 ····· | (300) |
| 第一节 | 整顿的开端····· | (300) |
| 第二节 | 整顿在工业、财经领域推开····· | (309) |
| 第三节 | 军队的整顿····· | (322) |
| 第四节 | 整顿深入展开····· | (330) |
| 第五节 | “四五”计划的完成····· | (355) |
| 第八章 | 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 ····· | (357) |
| 第一节 | 全面整顿中断····· | (358) |
| 第二节 | 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 | (367) |
| 第三节 |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 | (377) |
| 第四节 |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升级····· | (387) |
| 第五节 |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 (395) |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1966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我国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克服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满怀信心，努力生产，强烈地希望经济得到更快发展。

196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六六年》的元旦社论。社论中说，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一个宏伟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我们要在农村和城市更加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力争农业生产逐年有所增长，更加有效地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在不断技术革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现有工业企业的生产潜力和交通运输业的运输能力，同时要大力建设一批新的企业，加强国防建设，加强基础工业，加强交通运输业，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社论号召：我们要努力争取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社论的这些基本观点，体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取得调整时期重要成果的基础上，要求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反映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种发展趋向。

同日，《红旗》杂志第1期发表了题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元旦社论。社论中说，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就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社论批评了那种“经济好就是政

治好”，“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的观点，认为它是“错误的”。文章强调，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离开了阶级斗争，就无所谓政治；突出政治，就要在各条战线抓阶级斗争，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彻和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是无产阶级政治作统帅作灵魂，还是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作统帅作灵魂，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这篇社论的基本观点，反映了自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不断发展的现实，是党内另一种发展趋势的体现。

在当时，这两篇权威社论侧重点上的区别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1963年以来，虽然“四清”运动及意识形态领域中不断发展起来的批判使人们感到困惑和不安，但从严重困难局面中迅速恢复的国民经济又使人们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能够发动它呢？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毛泽东的这段话，集中地表明了，在苏共二十大前后，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他认为，曾经被全世界公认为社会主义唯一标准的苏联模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的弊端已开始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道路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又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一认识反映了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正确方向。但是，

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另一个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又摆在人们面前：如何解放思想、超越苏联模式？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怎样探索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简单地否定苏联模式就能走上改革的坦途？在改革苏联模式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各国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艰巨的努力，有的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进行这一探索，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对苏联模式的成功改革，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入观察，对本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外，还要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数十年的丰富实践和时代主题的巨大变化，解放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当代化。同时，还必须对当代资本主义、对时代及其发展趋势深刻而全面的把握。特别重要的是，顺利的改革还要有本国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是说，需要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为物质基础。这正如在一个小农经济占多数的国度里，对价值规律、现代管理、现代信用制度等的理解、重视和运用，远不能与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一样。同样是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观察和认识，比较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结论往往存在许多明显的区别。

毛泽东用于改革苏联模式的思想资源中，除了对苏联革命与建设实践的观察和思考外，还有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独特理解，有中国历史上对大同世界乌托邦的种种描述及他早期革命生涯中“新村”活动的烙印，更有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丰富而又成功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经验的影响。正是这种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中国当时改革的许多特点。1958年“大跃进”的尝试，虽然带有超越苏联模式的强烈愿望，但其中许多内容却往往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左。例如，忽视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对现代管理、制度、法制的陌生和轻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可能产生“资产阶级法权”的忧虑；崇尚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乃至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对物质利益可能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深切忧虑，相信简单的、不富裕的生活能产生和保持足够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反过来又可以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等等。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严峻的困难局面推动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纠正错误，调整经济、政治关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调整既是对传统模式的修复，也是对它一定程度的改革。比较实事求是的调整和探索很快取得了一批初步的成果，扭转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困难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努力都在不同方面反映着某种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问题在于，在当时的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尚未取得明显进展，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仍然步履蹒跚、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大背景下，在中国还落后的经济条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着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的条件，在政治方面的调整落后于经济调整的环境中，加之当时整个国际形势方面的诸多因素，中国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这样，调整时期产生的这些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新举措与有关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发展了。从1964年起，毛泽东把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这种忧虑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我国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一些矛盾。

1966年5月7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夕，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个报告的批示（即《五七指示》）中，又一次比较系统地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看法。他说：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除打仗之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我们的各抗日根据地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他认为，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

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最后，毛泽东指出，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当时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设想。这些设想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在随后的调整时期，毛泽东根据自己对1958年经验的总结和思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他放弃了“大跃进”时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发展了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长期性的认识。随着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加深和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在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中进一步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这些新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一些重要文件——如《五一六通知》以及《五七指示》——中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五七指示》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有许多近似的方面，它反映出毛泽东心目中所向往和憧憬的社会主义一些重要特征。这种社会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它以阶级斗争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保障，对生产者个人来说，则以阶级觉悟、革命精神作为压倒一切的激励源泉。在这个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对于商品生产，虽然不能不借助它来发展经济，但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必须加以限制。社会分工虽然是当前生产所必须，但因其会导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也要加以限制，并应创造条件使其逐步缩小。在分配领域中，也应缩小差别，甚至可以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因为物质利益总会诱发人们的物质欲望，直接威胁到道德的纯洁和高尚，导致精神的堕落，而革命的理想和阶级觉悟能够提供最强大和持久的动力，使劳动者能够并乐于完成任何艰难困苦的体力劳

动和脑力劳动。这种社会可能并不那么富裕，但这可能正是它的优越性所在，因为在一个富裕或高度富裕的社会里，人们往往会付出精神堕落、意志消沉和社会主义变质的代价……

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的这些认识，既反映了马克思经典作家当年对未来社会的某些构想，也包含了他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超越意识；既有我国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的深刻烙印，也有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影响。《五七指示》所展示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包含有一些大胆的设想和富于想象的预见，反映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一些尖锐批判，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追求，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不现实的。它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一种社会形态的决定性作用，脱离了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题，忽视了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它把以残余形态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当做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希望用不间断的阶级斗争和限制分工、限制差别、限制物质利益等方式来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些都带有经验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色彩。毛泽东提出的这些设想，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抗日根据地时已经这样做了，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革命战争时期有效的经验，在军队里正确的做法，是不是能无条件地推广到整个社会，特别是推广到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和改革，但这必须以生产力的现状与发展为出发点；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弘扬战争年代的革命传统和英雄主义气概，但不能简单地直接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但它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而且，这种发展的正确与否也必须由实践来检验。

1966年5月15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转发指示中指出，《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同年8月1日，为庆祝建军39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公布了《五七指示》的部分内容，并给予它极高的评价。《五七指示》中的基本思想和一些具体要求，在1969年后开始的全面“斗、批、改”运动中开始被全面付诸实施。它深入几乎所有部门和领域，表现为无数的试验、典型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及其在党内引起的分歧，成

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追求，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与中国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世界范围形势的左倾化、激进化是相关的。当时，中国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有一个经典的概括：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4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概括还是比较贴切的。当时，虽然在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集团或阵营中，分别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激进化和保守化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激进化处于主导方面。

自20世纪50年代起，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武装斗争此伏彼起，捷报频传，一浪高过一浪，旧殖民主义国际秩序土崩瓦解，资本主义阵营矛盾重重。对第三世界来说，60年代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革命运动高涨的年代。武装起义、游击战争、军事政变、外国干涉、血腥杀戮、政治动荡成为这十年的鲜明标记。在60年代，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20世纪的最高潮，基本上完成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使命。“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泽东诗）、“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叶剑英诗）、“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便是这种振奋人心的形势的真实写照。当时那些英姿英发、无私无畏、浴血奋战在丛林莽原、崇山大泽中的格瓦拉式的游击战士，长期成为全世界进步青年和西方左翼激进派心目中的偶像。

美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到处伸手，推行霸权主义，支持各种反动势力，镇压、破坏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受到各国热爱和平、追求进步人民的激烈谴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弊端的左翼思潮、学生运动和反对种族歧视运动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60年代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后，西方发达国家内广泛的反战运动更是空前高涨，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当局。1968年，从西方世界的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潮。青年人对现状的愤怒和反叛，汇成一股汹涌澎湃

的大潮。1968年5月，发端于年初的法国学生运动迅速达到高潮。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终于酿成10日的“街垒之夜”。整个巴黎烽烟四起，处处街垒。一位学生领袖声称：“今夜街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整整一代人在反抗某种社会制度。”5月28日，总人口5000多万的法国有1000多万人罢工、罢课，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五月风暴”中，学生、工人、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着胡志明、格瓦拉、毛泽东的画像，赫然在目的还有“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等大幅标语。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以至一位著名法国学者竟说：“在法国，你可以批评总统，却不能批评毛泽东。”“五月风暴”打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升平盛世”的神话，成为1968年甚至整个60年代左翼思潮和行动高涨的形象标志。人们甚至已经习惯于将1968年与1789年、1793年和1871年那些不朽的革命年代一样相提并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

与第三世界和西方发达国家左翼的激进化相比，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却表现出一种或隐或现的趋于保守的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出现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消灭剥削、发展经济、推进平等、捍卫和平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全世界进步力量感到鼓舞，也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惶惶不安。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反思已经开始，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开始对苏联模式的改革。改革一度使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出现了盎然的生机，但也难免因各自的历史传统、地缘政治、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各自领导人的不同经历、素质等等因素，产生了对改革的不同理解和实践，并因此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分化甚至分裂。应当说，这种争论、分歧和分化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它既给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损失，又推动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不论社会主义各国，世界范围内各工人党、共产党取得什么成就，发生过什么曲折，都是社会主义运动从古典、近代走向当代的这一历史必然性的反映。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曾一度有所收敛，但没多

久便又故态复萌，并愈演愈烈，引起了社会主义各国各党的不满和反对。由于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由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所作所为，中苏两党的关系不断恶化，直到60年代初展开了影响遍及全世界的大论战。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被“和平演变”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党，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欧洲以至亚洲、南美洲等一些党也已经被演变或处于演变过程之中；苏联等一些党的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是其国内新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共同作用的产物；如果中国不及时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则苏联的悲剧也有可能在中国重演。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全世界站在修正主义那边的党是大多数。同年7月，他在一封信中以一种沉重的心情写道，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相信马列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这反映了他对当时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的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观念的看法。

60年代以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对中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威胁，这种情况使毛泽东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危机感。他多次向全党提出帝国主义会不会进攻中国，中国有没有亡国危险这一类问题。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他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技术革命兴起及其引起的世界形势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注意不够。他从马克思、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一些结论出发，认为战争与革命仍然是当前时代的主要特征；世界形势总的格局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他要求全党不要怕打仗，要做好早打、大打的准备，要准备美国人来打，也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他过高地估计了爆发世界战争的紧迫性，以及由这种战争引发的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这种估计一方面使他对世界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和乐观精神，一方面对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压力下的国家安全感到忧虑。

20世纪60年代全球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形势和左翼运动、思潮的高涨，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的曲折以至停滞，对战争很快爆发的紧迫感觉，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世界形势、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进而也深刻地影响着其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影响着国内政策的走向。

三、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

1962年以后，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确立，随着调整时期中央在有关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问题上分歧的发展，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和争论的升级，毛泽东对中国党内出修正主义，特别是在中央内部出修正主义的忧虑加深了。

1963年8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时说：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阶层。

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时说：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

1965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三线问题时离开主题讲“造修正主义反”的问题。他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中多次批评中宣部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又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

1966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胡志明谈话时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①

这种忧虑使他更迫切地思考着使中国党永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永

^① 转引自徐达深总主编：《共和国史记》第3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反对修正主义的有效方法和途径。针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提出要全党注意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警惕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使帝国主义的预言和阴谋彻底破产。随着对中央一线领导不满的加深，他对培养接班人的考虑更加迫切了。

怎样才能找到一种既能有效地防止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出修正主义，同时又能培养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途径呢？“四清”、“五反”以及种种文化批判都尝试过了，但他认为这些运动仍不能解决问题，其原因在于中央内部存在着修正主义。1967年初，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谈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时曾经说，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才需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发动这样一场革命。

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对“中国赫鲁晓夫”的警惕，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在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因此引出的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三大改造、“反冒进”、“大跃进”等问题上，党内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这种分歧是正常的，而且后来往往都统一到毛泽东的认识上。60年代初调整时期，这种分歧逐渐发展了。这种分歧直接表现为1957年至1966年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发展起来的两个发展趋向。

在两个发展趋向中，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例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主张稳步推进的方针，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刘少奇、周恩来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有关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讲话，陈云有关“三为主、三补充”的重要思想，邓小平有关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的党建思想，1958年年底至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在纠正“大跃进”

错误时所提出的一些有关重视经济规律、重视发展商品经济、重视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能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等重要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在60年代初调整时期所取得的一批重要成果，等等。

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有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错误往往是因为真理越过了界限而产生的。正是这两种发展趋势的存在，成为毛泽东提出“党内赫鲁晓夫”的基础和原因。

同时，还应看到，在这十年曲折的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与错误的发展趋向也并不是泾渭分明地截然分开的。这两种发展趋向，在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它们不但共存于全党的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存在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之中。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毛泽东是“大跃进”的积极倡导者，但他又是最早发现“大跃进”的错误并着手纠正这些错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虽然一直坚持“大跃进”的一些基本设想，但他又支持了60年代初期中央一线领导的一些重要调整措施。他虽然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但他又要求阶级斗争不要妨碍当时的经济调整。在60年代初期的调整中，刘少奇在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改革色彩的重要思想和政策措施。对于1963年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他基本上是低调的和比较消极的。在“四清”运动中，他虽然不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类的提法，但对当时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他的估计也显得过于严重了。

自1953年起，中央便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在60年代，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泽东进行的全局